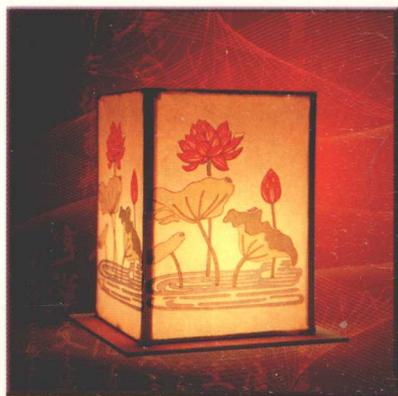


八十初度



陆耀东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八十初度

陆耀东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八十初度/陆耀东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5039-3734-7

I. 八… II. 陆… III. 文学评论—文集 IV. I06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00397 号

八十初度

著 者 陆耀东
责任编辑 张洪宇 程晓红
责任校对 方玉菊
责任印制 王敬华
封面设计 刘玲子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h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开 本 720 × 980 毫米 1/16
印 张 27
字 数 45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734-7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目
录



序 跋 集

- 《天外姻缘》序 / 3
- 重印《巴黎的鳞爪》序 / 7
- 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点上——中国现代作家文化心理分析》序 / 18
- 《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》前言 / 22
- 《文学的觉醒与选择》序 / 34
- 《中国现代两大文豪论》序 / 38
- 《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比较分析》序 / 42
- 《中国新诗理论研究》序 / 47
- 《思之思——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》序 / 51
- 《中国现代爱国诗歌精品》前言 / 55
- 《新诗体艺术论》序 / 58
- 《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》序 / 61
- 《世界短篇小说精华品赏》（中国现代部分）前言 / 64
- 《现代文学沉思录——西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论文选》
序 / 67
- 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》序 / 70
- 《中国诗学丛书》总序 / 73
- 《闻一多诗学论》序 / 78

- 情深意切写新声——序《落地生根》 / 81
- 《土地的家谱》序 / 83
- 《台湾现代诗与西方现代主义》序 / 87
- 《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》序 / 89
- 《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》序 / 92
- 《苍凉时代的灵魂之舞——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》序 / 95

论 文 选

- 关于《狂人日记》中的狂人形象 / 101
- 关于《故事新编》的几个问题 / 107
- 试谈鲁迅评尼采 / 121
- 鲁迅与“拉普”派
——关于几个文艺观点的比较 / 137
- 从创作过程看鲁迅“杂感”的特色 / 154
- 论艾青诗的审美特征 / 164
- 华文新诗之我见 / 182
- 再谈华文诗歌之我见 / 191
- 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初探 / 201
- 余光中：将在新诗史上长存的诗人 / 220
- 冯至《十四行集》独特的思维方式 / 225
- 王独清：欲推倒诗、画、音乐墙的诗人 / 240
- 论孙毓棠的诗 / 253
-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评价问题 / 268
- 回眸与前瞻
—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“入场”与“水磨工夫” / 279
-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个问题 / 286
- 现代作家全集的编辑与文学史料学问题 / 291
- 昭和前期日本文学在中国
——在日本弘前学术会上的发言 / 296

德国文学在中国（1915—1949）

——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讲演 / 300

访谈录

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

——访陆耀东 / 龙泉明 唐仁君 309

语文教学应还原语文本身

——陆耀东教授访谈录 / 剑男 315

关于冯至研究的对话 / 王光明 320

回眸五十年

——学术研究答问录 / 王桂妹 334

学术随想答问录 / 霍晓珊 345

评论辑

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研究现代新诗的成果

——评陆耀东著《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》 / 晓丹 355

“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”

——评陆耀东著《徐志摩评传》 / 秦弓 357

一部具有历史感的诗人论

——评陆耀东的《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》 / 田本相 362

现代诗歌研究的新开拓

——评《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》和《中国现代诗歌论》

/ 江建文 365

风力独具的诗人传论

——评陆耀东《徐志摩评传》 / 邹建军 368

“盖棺，如何论定”

——读陆耀东著《徐志摩评传》 / 张中良 372

植根沃土叶常新

——评《中国现代四作家论》 / 秦新文 376

踏遍青山人未老

——陆耀东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品格评述 / 龙泉明 380

历史的还原与还原的艺术

——评陆耀东新著《冯至传》 / 赵小琪 鲁道祥 390

读《冯至传》 / 王桂妹 394

《中国新诗史》(第一卷)研讨会综述 / 杨庆祥 401

陆耀东教授《中国新诗史》第一卷出版 / 颜同林 406

严谨治学写诗史

——评陆耀东先生的《中国新诗史》(第一卷) / 陈卫 409

陆耀东学术成就简介 / 《江汉论坛》编辑部 414

陆耀东教授之新诗及其现代文学研究 / 温泉 王毅 417

八十初後 / 序跋集 ㊦

《天外姻缘》序

我知道本书作者很勤奋，对待创作，态度严肃，在艺术之峰前努力攀登；创作和演出，有着自己的特色，在湖北，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听众，收入本集的《挂牌成亲》，在全国优秀曲艺作品评奖时，荣获一等奖；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，在武汉市1980年创作剧（节）目交流演出中，也被评为优秀创作节目。我认为《风雨送春归》、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天外姻缘》均属可取之作。

今天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曲艺创作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之间的关系，很值得研究。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苏汶对左翼作家的责难，指出：“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，不至于蠢到不知道‘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，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’，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、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。而且我相信，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、弗罗培尔的。”（见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）这些话，已为历史所证实。中国四部优秀长篇古典小说中的两部——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就是源于话本，再创作而来。我觉得，我们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作者，在学习中外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的同时，应重视向曲艺学习，使现代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，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；曲艺工作者也应学习中外小说、诗歌、戏剧的长处，使我们的传统艺术不断革新，向现代化方向发展。自然，这种学习，是“恰如吃用牛羊，弃去蹄毛，留其精粹，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，决不因此就会‘类乎’牛羊的”（见鲁迅：《论“旧形

式的采用”》)。

何祚欢同志的这些湖北评书，最可贵的是，它的思想内容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。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，既继承了湖北评书的传统，又着力于融入现代小说的某些因素，使湖北评书这种传统艺术有所发展。

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：作者没有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上，而是深入发掘特定题材中蕴含的深刻意义。《挂牌成亲》、《天外姻缘》和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三篇都以爱情婚姻纠葛为线索，主题却不一样。《挂牌成亲》通过张大毛、刘大菊这一对农村干部的成亲，歌颂了一心为人民，一心为别人的可贵精神；《天外姻缘》以马少云、于丽娟在苦难中结合为线，唱出了一曲正气歌，有力地批判了“四人帮”及一切“无情操”的人。即使是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，意义也不仅仅是歌颂爱情自由、婚姻自由。我们不主张作者在这类作品中硬贴上政治标签，也不欣赏那种只写“卿卿我我”的“爱情”作品。依我看来，何祚欢同志虽然也写“鸳鸯”，但和“鸳鸯蝴蝶派”不可同日而语。

至于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风雨送春归》，前者无爱情纠葛穿插，后者中那位老太婆去参加女儿婚礼，不过是一引子。《刘春“赶考”》既提出了破格录取人才问题，又颂扬了苦学成才的道路。《风雨送春归》主要是写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。两篇都具有现实意义。

评书正如小说一样，大概有的是以事件为主，用情节新奇取胜；有的是重在塑造人物，以人物性格鲜明见长。本书中的《双花轿》等篇近似前者；《挂牌成亲》、《刘春“赶考”》和《风雨送春归》等篇近似后一类。我是比较偏爱后一种作品的。这一类作品，人物跃于纸上，形象鲜明而不单薄，情节生动而又自然，生编硬造痕迹不多，读后发人深思。故事情节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，故事的发展合乎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。我们知道，故事情节对评书绝非可有可无之物，评书如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就不能引人入胜。但如果把人物概念化了，则无论故事如何曲折离奇，也不能留下深刻的动人形象。

何祚欢同志塑造的人物形象，大多是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新人。《挂牌成亲》中的张大毛、刘大菊，《刘春“赶考”》中的刘春、李值，《风雨送春归》中的关仲贤，《天外姻缘》中的马少云、于丽娟，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中的曾金奎、乔玉梅，性格各异，但都是令人可敬可信可亲的人。从作者所塑造的这一系列形象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美学趣味：他喜欢那些硬朗刚强、有韧性的

人。张大毛、刘大菊、刘春、马少云、于丽娟，处于逆境困境中而不失信念，甚至连淡淡的哀怨也没有，这些人物不是像苍蝇在玻璃窗上乱撞，不是在黑夜中一味泣诉，而是透过浓黑的夜空，看到一线曙光。张大毛、刘大菊坚信从实际出发为人民办好事没有错，即使受惩罚也不是耻辱；刘春在“四人帮”的“知识就是罪恶”的叫嚷声中，坚信祖国富强需要文化科学知识，发愤自学；马少云、于丽娟在绝境中，看到了埋在地心的怒火和群众中的同情的目光，没有对生活绝望；《乔书记乱点鸳鸯谱》中的曾金奎、乔玉梅所受的压力较轻，而他们也以巧取胜。我绝不赞成作者只塑造和歌颂一种人。但是，成熟的作者应该有自己的特长，有自己的美学理想。鲁迅在作品中常批评农民的弱点，又寄希望于农民；茅盾善于写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；老舍笔下常带感性的人物，多是正直的人；巴金作品中的进步青年，不免有种种毛病，却都是追求光明热爱大众的人。我这样说，并没有把何祚欢同志与这些艺术大师相提并论的意思，也不是说，写这种硬朗人的作品就好，写格调低沉的就都不行（格调低沉而能促人产生一些积极的思绪的作品，也应肯定）。不过是想说明，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，值得赞许。我特别欣赏《挂牌成亲》中张大毛被挂着黑牌游乡，仍给农具农机修理站招揽生意，刘大菊见义勇为，公开自己对他的支持和爱情那一段描写：

刘大菊说：“你怕惹祸？我怕挨饿！天上掉得下白馍馍？哪个队都有机械要修。老张，跟我走吧。”

张大毛想到刘大菊这些年的处境，有点犹豫：“哦，莫慌，……莫慌。”

大菊一听，仰天叹道：“人家都说，‘寡妇门前是非多’，偏偏惹是非的又是个我！好好好，你老老实实去‘请罪’吧。”

张大毛被搞得手忙脚乱：“老刘，不是这意思……”突然，他把脚前的牌子往刘大菊面前一举：“你看，这要连累你的！”

“哈哈……这玩意儿哪个没挂过的？它压不死人！你不嫌我，我也不嫌你。跟我去吧，填饱了肚子好干活儿。”

大毛和大菊二人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很细，大菊的思想性格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所表现的，不正是中国人民中最可宝贵的性格么？有了这样的人民，什

么艰难困苦也压不垮我们。读者读了这样的作品，受到激励、鼓舞，一股向上、向前的动力自然涌现，这就是文艺的特殊作用，文艺的神奇力量。

作者在艺术上，近年来渐趋纯熟。片断的故事，一两个场面，少许细节，或几句具有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，就能使人物生龙活虎般站立在读者面前。对于湖北评书的种种艺术手段和形式，不仅运用自如，且注意融进现代小说、戏剧的某些因素，既保存了评书的特点，又有突破，使评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革新。应该着重指出：在曲艺创作和表演中，如何把娱乐性和思想性、欣赏作用与教育作用结合起来，这也是一个不易处理好的问题。如果一味追求笑噱，而又流于油滑庸俗或肉感色情，那是应该摒弃的。何祚欢同志的作品，在这一方面处理得较好。

鲁迅在《门外文谈》中尖锐地批评了“迎合大众”的人，指出：“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，甚至于说要‘迎合大众’，故意多骂几句，以博大众的欢心。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，但这样下去，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。”他还说：“拿了无益的，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”，去“迎合大众”，是绝对要不得的。这值得我们的作家深思。我们不能说何祚欢同志的作品没有缺点，但没有或很少表现出迎合落后人们要求的种种倾向，确属难能可贵。

本集中的作品，写历史题材的较现实题材的略为逊色，而且，即使在我以为较好的几篇中，也并不平衡，例如用作集名的《天外姻缘》一篇，收尾略嫌仓促。我的判断很可能不准，请读者去欣赏何祚欢同志的原作。我相信，他的作品，人民是要看的，是会欢迎的，读后一定能作出更恰切的评价。

（《天外姻缘》，何祚欢著，中国曲艺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）

重印《巴黎的鳞爪》序

由我来为这本书写序，实属偶然。如果选择最合适的人，恐怕还是赵家璧先生、沈从文先生、陈从周先生等较妥；在我同辈学友中，宜于作此种文字者亦多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：出版社最初请赵家璧先生写，赵先生在复函中请编辑同志和我联系；同时给我来信说：

前蒙赐赠大作《徐志摩评传》一册，拜读后，感到传记部分，字字有根据，写作态度严肃认真，与有些人着眼诗人私人生活的文章完全不同；而你的评论，我认为既符合史实，也符合诗人的个性，可称最值得给徐志摩研究者提供资料的一本好书！后面三篇分评作品的专论，说明你这几年确实下了扎实的研究功夫，值得我向您学习、致敬。

前月接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来信，约我为该社拟重印的《巴黎的鳞爪》写一篇序言。我认为这一任务由你来承担，肯定比我更胜任，因而向该社去信推荐您。兹特将该社复信附奉，希望同意……

此后一个月內，编辑室几次来信催稿，赵先生虽八十高龄，但仍和五十年前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时一样，谦虚为怀，奖掖后进。我为前辈的这种精神和温爱所激动，不写于心不安，于是，只好向读者奉献这未熟的青果。

徐志摩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，他的散文集《巴黎的鳞爪》也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。有争议的作家或作品之所以引起“争议”，往往是由作家或作品的复杂性引起的；对这类文学现象，切忌简单化，无论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，都与实际不符，都不免片面、悖误。

这本散文集，作于1924—1926年。除《天目山中笔记》外，都是写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的人事和自然风光。有关法国、英国社会生活的散文，艺术整体呈纷繁状态，历来的评论往往毁誉参半。我以为要领略作品的真义，得仔细阅读作者为《巴黎的鳞爪》这一组散文所写的前言：

咳巴黎！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；尝过巴黎的，老实说，连地狱都不想去了。整个巴黎就象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，衬得你通体舒泰，硬骨头蒸酥了的——有时许太热一些……

但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，赛西河的柔波里掩映着罗浮宫的情影，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后的呼吸。流着，温驯的水波；流着，缠绵的恩怨。咖啡馆：和着交颈的软语，开怀的笑响，有踞坐在屋隅里蓬头少年计较自毁的哀思。跳舞场：和着翻飞的乐调，迷醇的酒香，有独自支颐的少妇思量着往迹的怆心。浮动在上一层的许是光明，是欢畅，是快乐，是甜蜜，是和谐；但沉淀在底里阳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经验的本质：说重一点是悲哀，说轻一点是惆怅；谁不愿意永远在轻快的流波里漾着，可得留神了你往深处去时的发见！

在徐志摩看来，巴黎既是人间的“天堂”，又是精神的“地狱”。《巴黎的鳞爪》这一组散文，恰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。其中《九小时的萍水缘》写的正是巴黎人的一个带血泪的故事。女主人公十七岁时与一个有爵位的英国人结婚，婚后一直过着没有情爱的所谓夫妻生活，四年后离婚，回到巴黎；不久迷上了一位菲律宾人，谁知这也是个薄情人，将她抛弃在远离故土的东方，她靠做保姆过活，后因父病重来电催归，才有机会与老人诀别。这时，她带着深深的心灵的创

伤，怀着绝望，度过暗淡的时光。她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，但始终未觅得一个忠诚的爱侣；欺骗，又一次欺骗，接连降临在她的身上。这虽然只是巴黎人生活海洋中的一滴泪，一滴血，但确实是“花都”“人事经验的本质”。读者当可一斑而窥全豹。《“先生，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？”》，通过一个受过西方人生观洗礼的中国画家的口，半是欣赏，半是对中国封建观念揶揄的态度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女模特儿的形体美。它同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心理是相悖的，但如果从艺术家对人体美的欣赏角度说，是无可非议的，记得鲁迅先生于1922年写的一篇文章，就痛感于一些文艺批评家连基本的常识也缺乏，他希望批评家“知道裸体画和春官画的区别，接吻和性交的区别”^①。像《“先生，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？”》这类作品，近似裸体画，并非淫秽物。我们可不必提倡，但应允许它的存在。它对封建的陈腐观念有冲击力；也可能产生副作用，但如正确引导、分析，就可将副作用减少。这里，我们也应该学习鲁迅。据许广平说：“对于孩子的性教育，他是极平凡的，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。赤裸的身体，在洗浴的时候，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。实体的观察，实物的研究，遇有疑问，随时解答，见惯了双亲，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，没有什么惊奇了。他时常谈到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场所，往往不敢跑出水面，给日本女人见笑的故事，作为没有习惯训练的资料。这也正足以针对中国一些士大夫阶级的绅士们，满口道学，而偶尔见到异性极普通的用物，也会涉遐想的讽刺，这种变态心理的亟须矫正，必须从孩子时代开始。”^②

书中以康桥、牛津为描写对象的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、《吸烟与文化》，深情地诉说了作者蒙康桥文化洗礼后的思想变迁：

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。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，一个人就会变气息，脱凡胎。我敢说的是——就我个人说，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，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，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。

^① 鲁迅：《热风·对于批评家的希望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，第469页。

^② 许广平：《欣慰的纪念·鲁迅先生与海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7月出版，第181—182页。

是的，徐志摩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受康桥文化影响最大者。他的政治思想，他的伦理道德观念，他的私生活，他的文艺思想，都受康桥思想文化的制约以至支配。这种影响并不像徐氏所说的那样尽善尽美，相反，有重大的局限和消极性，最明显的是导致了徐氏政治上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。

但是，我们也应看到，康桥文化使徐志摩改变了以前热衷于政治，“想做一个中国的 Hanmilton”^① 的志趣，所以，在《吸烟与文化》的结尾他写道：

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；我只要“草青人远，一流冷涧”……

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以浓情重彩描绘赞美康桥景色。此文可与诗《康桥再会罢》、《再别康桥》并读。艺术上，恐怕无人否认它是一篇美文，但有人认为，作者对异国胜地如此一往情深，可见他毫无爱国之心。实际上这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，即使从理论逻辑上说，爱国者也不是不可以爱别国的美丽山川的。应该说，它内容上无大失误，而能将康桥自然风光的美尽收画面中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，有它独特的价值在。

《翡冷翠山居闲话》对意大利这座名山实绘很少，主要是抒情写意。他发挥了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中提及的若干观点：要发现对象，必须“单独”，必须排除世俗人寰的杂念，保持灵性的纯真。从这里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徐志摩对现实社会是失望不满的。

《天目山中笔记》是本书唯一取材于中国的作品。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人生和佛理的问题：西方人出家，“他们是情感方面的转变，原来对人的爱转移作对上帝的爱，这知感的自体与他的活动依旧不含糊地在着；在东方人，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灭，皈依佛法或道法，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迹的解脱。”徐志摩夸大了两者的差异，忽视了两者的相近。前提条件的设想不准确，由此而提出的问题也就失去了重量。

谈外国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的几篇文章，《达文睿^②的剪影》是摘译；《济慈

^① 汉密尔顿 Alexande Hanmilon (1757—1804)，政治家，美国联邦党领袖，曾任华盛顿秘书；1789—1795 年任财政部长。

^② 达文睿，通译达·芬奇。